

屐痕处处郁达夫

李杭春◎著

钱江新潮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屐痕处处郁达夫

李杭春◎著

钱江新朝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屐痕处处郁达夫/李杭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6

(钱江新潮文丛)

ISBN 978-7-5203-2162-4

I. ①屐… II. ①李… III. ①郁达夫(1896-1945)—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312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杨 林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丛书总序

浙江大学是一所人文璀璨、名师荟萃的全国重点大学，其前身是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百年浙大，一路风雨，一路辉煌。在这块深厚的土地上，它不仅哺育了马叙伦、马一浮、沈尹默、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张其昀、谈家桢、卢鹤绂等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大师，而且在长期的办学中形成了堪称典范的求是精神。尤其是在竺可桢主政期间，于极其艰难的西迁办学中更是把这种“求是”精神发挥到极致，使浙大声名远播，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浙大中文系办学历史悠久。往远说，可追溯到林启主持的求是书院。办学伊始，书院即开设国文课程，先后延请宋恕、陈去病、马叙伦、沈尹默、张相等著名学者授业讲学——以此算起，中文系已历春秋百有十载；往近说，则源于1920年的之江大学国文系和1928年的国立浙江大学国文系——就此而言，中文系悠然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它前后历经西迁时期、龙泉分校时期，后又融合之江大学国文系、浙江大学国文系两大主脉。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文系被划归由浙大“母体”孵化出来的新的分支——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嗣后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组建的杭州大学合并，称杭州大学；从这时开始，浙大中文系便进入了“杭大中文系”时代，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杭大中文系”的系名，一叫便是整整四十年，并已在社会和学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直到1998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在经历了一番分分合合之后又返回到了

它的母体怀抱。现在的浙大中文系是以原杭大中文系为主体的，自然，它也整合了其他相关的师资力量。

浙大中文系自建系以来，人才辈出，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祝文白、缪钺、刘大白、丰子恺、许钦文、夏承焘、姜亮夫、钱南场、胡士莹、徐声越、陆维钊、任铭善、王季思、郑奠、王驾吾、孙席珍、王西彦、蒋礼鸿、徐朔方等一大批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杏坛名师、学术名流都曾于此任教。他们实践的“传承创造”的学术精神和追求的“卓然独立”的学术境界，为中文系的发展，包括有特色、有影响的学科的创建，也包括有特色、有发展后劲的梯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百年沧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的目标，祈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回顾往昔，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竺可桢老校长在20世纪40年代所讲的这句话的深刻含意，也越发怀念为中文系发展做出贡献的诸多前辈和老师，并油然萌生了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和发展中文系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浙大中文系已发展成一个实力雄厚、在国内很具声誉和影响的系科。特别是自1995年被批准为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以来，更是在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在全国同类专业的高校排名中一直居于前列。中文系也由原先单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成为涵盖汉语言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三个本科专业和一个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的立体多元、结构合理的“大中文”专业。目前，中文系已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7个二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古典文献学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4个学科为浙江省省级重点学科。汉语史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有在编教师50人，其中教授26人（博士生导师25人），副教授14人。他们不仅在各个学科发挥重要的带头和骨干作用，而且在国内学界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在这批以四五十岁

的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核心的努力和引领下，由夏承焘、姜亮夫等前辈学者所开创的，吴熊和、王元骧等名师宿儒所光大的中文系学脉，方能做到承传有自、薪火绵延。

这次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钱江新潮文丛》，所收的是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在职教师的系列学术论著。他们中有30多岁的学术新锐，也有五六十岁的年长或较年长的一代学者。涉及的范围，包括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影视文学等不同学科。在这里，学科与学科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彼此是有差异的，思维理念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在努力追求和体现中文系传统的“求是博雅”学风。章学诚评价古代两浙学风时曾谓：“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浙大中文系以“求是博雅”为系训，正是因为非求是则无以成专家，非博雅则无以成通儒。所谓“求是”，就是求真、求实；所谓“博雅”，就是求善、求美。这反映了我们力图贯通浙东西、融合古与今的学术视野与意识，以及从传统的学脉中创造新的浙江学派的愿望，也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学术观的一个投影和富有理性的特殊呈现。尽管面对浙大中文系的百年历史和悠久传统，本丛书中的这些成果尚远不能说是“雏凤清于老凤声”，在这方面，我们深知与前辈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中文系数十位教师用心血和智慧浇灌出来的这些学术之果，毕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求是博雅”作了新的诠释，这是很可欣喜的。可看作对中文系近十年学术研究的一次检验，一次富有意味的“集体亮相”。

这些年，由于种种原因，学术浮躁和浮夸之风盛行，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不端行为也屡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文系老师“守正创新”，一方面继承了百年来的优良学术传统，不盲从、不浮躁，以“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求实学风，孜孜不倦地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坚守着学术正道；另一方面不囿于陈说，锐意创新，力求在前人基础上有新的发现，为学术研究做出自己创造性的贡献，这十分难能可贵。而这一点，在这套丛书中也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不尚空谈，不发虚词，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崇尚事实为基础，强调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我想，这就是

浙大中文系生生不息的学术传统，它贯穿百年而又存活于当下，已内化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生命，一种支撑当下中文系存在和发展、坚守学术家园的“阿基米德点”。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就是弘扬浙大中文系这一学术传统，继往开来，进一步加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为提升和扩大其学术水平及影响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中文系 1984 届校友、浙江通策集团董事局主席吕建明先生的鼎力相助。2007 年 5 月，在浙江大学 110 周年校庆期间，他慷慨捐资百万元支持中文学科建设。他的善举和情意令人感佩，也催发了我们策划并编纂此书的积极性。缘于此，我不仅对本丛书所反映的教师学术才华和追求感到欣慰，同时更对百年浙大中文学科未来的发展前景抱持一份坚定的信心。

钱潮天下奇观，故孙中山先生有“猛进如潮”之赞，学术创新，贵如潮水之猛进荡决；钱潮及期而信，故吴越王钱镠有“日夜波涛不暂息”之感，学脉传承，当如潮水之永不止息。“求是博雅”，就意味着学者既要有弄潮儿那般“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的锐气，也要有“晚来波静，海门飞上明月”的心境。本丛书以“钱江新潮”为名，其微意实在于此。

吴秀明

2009 年 4 月 15 日于浙江大学

序

郁达夫与鲁迅同为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就文学影响来讲，郁达夫恐怕是仅次于鲁迅的一位现代小说作家。而且，因为小说、散文（日记、书信、随笔、杂文）、诗、文艺评论等全体裁的创作实践，“烈士”作家的特殊身份和非同一般的传奇经历，郁达夫研究无疑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本书作者李杭春离开教学科研岗位七年，仍不断有各地学生慕名来电来邮，希望能成为她的研究生，步入郁达夫研究的大门，可见研究之热。

据我所知，杭春的郁达夫研究始于20年前，那段时间她醉心于叙事批评，对现代小说、影视甚至新闻叙事都尝试进行叙事学分析。以“他一叙事”逻辑考量郁达夫“私小说”特色，在今天看来都不失为郁达夫研究的一个有效维度。

2006年，在“浙江文献集成”和“郁达夫诞辰110周年”两个事缘的综合作用下，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启动了《郁达夫全集》编纂项目，杭春参与其中，并且很快全力以赴，在一年半时间内完成浙大版《全集》编纂的同时，还整理了两份颇费功夫的郁达夫研究资料：《郁达夫研究资料索引（1915—2005）》和《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一些基于《全集》篇目审定、文字校勘和史实考辨的文字则在其后几年里陆续面世，其中一部分已被收入这本郁达夫研究专题论文集。当然，遗憾的是，学校却等不及这些成果。这项被2010年业绩考核为“零”的全集编纂和史料整理工作对她的影响至为重大，一方面让她在学校人事改革所谓“岗位分流”时竟被果断“分流”；另一方面，意想不到

的是，也奠定和促成了她日后史料耙梳与学术直觉高度结合的学术个性。本集中多篇论文即呈现这样的端倪。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2011年年初，她离开教学科研岗位，在琐碎繁杂的行政工作之余，查资料、作论文几乎占据了全部的业余时间，每天工作大概是常人的两到三倍吧。据她自己后来回想，有一年，她不上班不看书不写字，全天给自己放假的时间只有3天！这样拼命苦干的结果，是她不单拿出了《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1936—1949）》这样条清缕正的学术专著和《重走西迁路——我的求是精神之旅》这样嫣然可掬的诗性散文，有一段时间还顶着学术界贸然形成的“郁达夫研究专家”的头衔赴各地演讲，让她尤其钟爱的课堂教学持续了两三年，并且整理成为这部集子里的一部分内容。我知道，一个热爱教学并且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一旦失去讲台，那会是一种什么滋味。当年因为在各地作演讲，而郁氏本人也是“展痕处处”，所以，应了常说的那句话，“哪座山头唱哪支歌”，杭春的演讲“巧遇”的是各地奔波的郁达夫。这些与不同人文地理相结合的研究归在一起，就自然形成了一幅别具生面的“郁达夫学术地图”。可惜实在是分身乏术，现在的地图“画”得远不够完整。希望她还有时间和能力继续“画”下去，以切实推动浙籍现代作家的研究，推进浙江文化大省的建设，体现浙江大学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

令我颇感欣慰的是，今年杭春申请立项了一个省文化工程重点项目“郁达夫年谱”。这是她郁达夫研究计划当中的一部，当然她自称这个计划原本要等退休后才能实现，现在能够获得各地专家举荐，提前开展和完成，自然是一桩好事；而且，能够获得项目和经费支持，不至于像之前那样赤手空拳做研究，我也很替她高兴。希望她能一如既往，在任何环境下，任何工作和研究领域，都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独立思考和人文关怀，不放弃自己沉醉和迷恋的学术事业。这一点，我是心存默契并且抱有信心的。

是为序。

陈 坚

2018年1月18日

于杭州启真铭苑

目

录

第一章 “屐痕处处”：地域文化视野中的郁达夫	1
一 郁达夫与北京	1
二 郁达夫与安庆	14
三 郁达夫与上海	26
四 郁达夫与杭州	36
五 郁达夫与国立浙江大学	46
第二章 “二诗人”：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郁达夫	61
一 郁达夫与鲁迅	61
二 徐志摩与郁达夫 ——以《爱眉小札》与《日记九种》为中心	71
三 郭沫若、郁达夫比较研究综述	80
四 海外郁达夫研究漫评	90
五 20 世纪中国文学视域中的郁达夫	102
第三章 “艺文私见”：郁达夫“自叙传”写作管窥	108
一 郁达夫：私小说和“他一叙事”	108
二 郁达夫：相对于“自传”的“自叙传”	114
三 郁达夫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个人化写作	124

第四章 “炉边独语”：文本细读与全集校订	137
一 “圆明园情结”与郁达夫创作	
——读郁达夫遗文《圆明园的一夜》	137
二 从《雁荡山的秋月》看郁达夫游记散文	144
三 关于一则郁氏佚文的疑问	150
四 从《郁达夫全集》的文字审校看新文学典籍的 校勘和考辨	159
五 《郁达夫全集》校订札记	168
附录	178
一 郁达夫可作当代人镜子	
——《苏州晚报访谈》	178
二 从作家郁达夫到战士郁达夫	
——《富阳晚报》访谈	183
后记	187

第一章

“屐痕处处”：地域文化 视野中的郁达夫

一 郁达夫与北京

今天讲的题目是《郁达夫与北京》，这是一个比较应景的题目。一大清早赶来听讲的朋友，或许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话题中的两个关键词：郁达夫、北京。在座可能有的是对郁达夫感兴趣，也有可能对北京，尤其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文化或者历史感兴趣。我觉得这是最宜在北京演讲的郁达夫题材。当然，类似的演讲，如果放在上海，可能是《郁达夫与上海》；放在杭州，就是《郁达夫与杭州》。因为我们都知道，郁达夫一生都在漂泊，他是一位屐痕处处、四海为家的游子，一位任何意义上的行吟诗人，足迹遍布东中国和东南亚。除了北京、上海和杭州，他还在广州、福州、安庆、武昌停留过半年以上，至于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更遥远的印度尼西亚，更是他此生逃脱不开的宿命。今天在这里想以《郁达夫与北京》为题作一点不成熟的思考，还望向各位北京的朋友请教，请大家批评。

这个标题所蕴含的考察角度，或者说立论的基础，应该是北京和江南两地的文化差异，这是我们释读诗人独特气质的一个解码器。郁达夫生在富阳，长在江南，出生地文化带给他的，除了清瘦的身量、苍白的容颜，还有与生俱来的细腻、敏锐和多愁善感。他爱读书，爱作诗，爱江山，爱美人，具备一位江南才子的全部气质；而北京，身为皇城数百年，又居燕赵慷慨之地，那种雍容华贵和沉静辽阔的气象，是郁达夫的成长环境所不具备的。所以，当一位江南诗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抵达北京，当出生地文化遇上截然不同的寓居地文化，这位诗人的生命曲线、文学曲线会发生怎样的波动？

本次讲座准备从三个层面展开：郁达夫在北京，郁达夫写北京，郁达夫和北京。这不是文字游戏，三个部分各有可以回顾和联想的内容。

（一）郁达夫在北京

郁达夫与北京有比较完整的交集，并且在他的创作里留下了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的，主要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9年9月下旬到11月上旬。1919年夏天，郁达夫从八高毕业并考入东京帝大，9月4日，应长兄郁华之召，郁达夫回国，自杭州富阳辗转至北京参加外交官、高等文官考试，这年11月离返日本。

1919年的外交官考试安排在9月26日，我们读郁达夫的诗，发现他9月22日还在“夕阳影里过徐州”，到得匆忙，所以错过了志在必得的外交官考试；而高等文官考试第一试（甄录试）10月14日开始，第二试（正试）安排在10月19日。郁达夫10月19日有诗《晨进东华门口占》，说的是这天天未晓时走进紫禁城东华门内正试试场时的情景和心情，这说明他通过了14日的海选，但这一天的正试却未能通过。所以，心情郁闷和愤懑是可想而知的。有他当时题的诗为证，如《己未秋，应外交官试被斥，仓促东行，返国不知当在何日》。

外交官、文官考试制度是作为中国传统科举制的替代物出现的。1905年，科考制度宣告终结，为顺应时代潮流，选拔国家栋梁，北洋政府设立了自己的外交官、文官考试制度。现有资料表明，1913年1月9日北洋政府公布了《文官考试法》，1918年又修订出台《高等文官考试

法》，但考试科目大多是法学内容，未经专门准备的郁达夫名落孙山，自然不足为奇。

这两个月的经历和感受，郁达夫在他的一些文字中有所还原。

庸人之碌碌者反登台省；品学兼优者被黜而亡！世事如斯，余亦安能得志乎！余闻此次之失败因试前无人为之关说之故。夫考试而必欲人之关说，是无人关说之应试者无可为力矣！取士之谓何？

——1919.9.26 日记

……夜月明，与养吾、曼陀踏月论诗，出阜成门，沿河缓步……

——1919.10.5 日记

第二年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长兄家里去住了三个月。……这一年九月里，我因为在荒废的圆明园里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寒，害了一场大病。

——《血泪》（1922.8 作）

这个时候，刚刚过去的五四学潮拉开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序幕，青年人反帝爱国热情被点燃，质疑旧传统、创造新规范的言行被追捧，郁达夫也不例外。日记中他感慨：

山东半岛又为日人窃去，故国日削，予复何颜再生于斯世！今日与日人约：二十年后必须还我河山，否则予将哭诉秦庭求报复也！

——1919.5.5 日记

综合来看，这两个月，诗人主要经历了两件事，一是参加两项考试均告不第；二是初游北京，一个人彻夜凭吊圆明园遗址。这两场经历唤醒了郁达夫由来已久的情感体验：义愤和反抗。

这一年，郁达夫不满 23 岁。

第二个阶段，是断断续续的，但相对时间较长，从 1923 年开春到 1926 年仲秋。据郁达夫小说《十一月初三》的记录，这一次的北上，是“在上

海想以文艺立身的计划失败之后，不得已承受了几位同学的好意，勉强的逃到北京来”。自1922年7月从东京帝大毕业，郁达夫先在上海主持《创造》季刊，9月赴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3年2月初学期末辞职，孑然一身来北京长兄郁华处小住，其间结识了鲁迅和周作人等在京名流。为周作人以他的号召力“振臂一呼”，替自己摆平了关于《沉沦》的许多非议，郁达夫一直心存感念，抵京不久（2月11日）即主动联络周作人。2月17日（大年初二），周作人设家宴请北大友人和浙江老乡，特别邀请了郁达夫，鲁迅作陪。这个时候周氏兄弟尚兄弟怡怡，关系很好，郁达夫由此结识鲁迅。查《鲁迅全集·日记（1912—1926）》卷，1923—1926年在京期间，郁达夫与鲁迅往来19次。这在鲁迅的“门客”中交往次数绝不算多，与日后在上海双方的频繁交往也不能比，但彼此都留下了好印象，并开始长久和深厚的友谊。1927年，因为《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鲁迅发现郁达夫居然被看成“危险人物”，连连称“奇”，并说：“达夫先生我见过好几面，谈过好几回，只觉得他稳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人，更何况得罪于国。”（《鲁迅全集·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可见两者堪称知音。

3月初，因为老祖母离世，郁达夫返富阳；10月10日，郁达夫应北京大学之聘，接替陈豹隐的统计学课，再抵北京，仍借住兄长郁曼陀家，给侄女郁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年春天郁达夫将妻儿接到北京，后来搬到什刹海，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其间虽亦赴武昌、上海、广州谋生，行迹仍漂泊无定，但总算有了能与子女家人共享天伦的两个暑假；直至1926年端午期间遭遇长子的早夭，仓皇间自广州北上，10月离京南返。

这一段时间，五四新文学的重镇非北京莫属。就郁达夫而言，一方面，在与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新文学阵营紧密接触的过程中，郁达夫在新文坛声名鹊起；另一方面，1922年，郁达夫已从东京帝大毕业，没有了官费的接济，找不着稳定的工作，又有家室需要自己独立支撑，郁达夫开始感受“生的苦闷”。这三年里的东奔西走，基本都是为生计打拼。所以，可以说这一段经历，让郁达夫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世事的乱离困厄；而与这个阶段的经历感受密切相关的创作，我们看到的是《薄奠》和《一个人在途上》。

第三个阶段，1934年8月14日到9月5日，凡二十天。郁达夫自称

是“不远千里”从杭州经青岛去北平，8月14日，“晨八时余，抵正阳门车站，十年不见之北京故城，又在目前了，感慨无量”（《避暑地日记》）。这20天纯粹是避暑加外交。因这一年杭州高温，据郁达夫《故都日记》记载，9月初杭州气温还在华氏100度，差不多摄氏37度以上；而北平只80多度，相当于不到摄氏30度。所以，在北平赏秋，游景，买书，写作，访故，会友，郁达夫的这一次故地重游还是比较舒心的，而且，翻看《故都日记》，这20天里他专程拜访和会见的旧友，被称名道姓的就有近70人次。这个时候，诗人年近不惑，早已功成名就，又与王映霞结婚多年，生活状态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次重游，应该是诗人尽兴而畅快的一次，其对老北京城沉着大气的充分体会和美好记忆，被记录在《故都的秋》和《北京的四季》等作品里。

（二）郁达夫写北京

我们选择郁达夫与北京寓居相关的三个作品，看看郁达夫笔下与北京相关的人和事。

1. 《圆明园的一夜》

《圆明园的一夜》是郁达夫记在1920年6月2日、3日的日记里的一篇日文小说试作，今为残稿，2007年浙江大学版《郁达夫全集》将其收入《小说》卷。这篇小说的构想显然与郁达夫的一个文学计划有关：他原计划与四位八高的日本同学合作创办一本日文文学杂志《寂光》。“寂光”在汉语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和常见的搭配，但在郁达夫的创作中我们却不正一次看到过它的行踪。比如鲁迅去世不久，郁达夫写下悼文《怀鲁迅》，其中即有“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的表述。在日文中，“寂光”有“寂静的光”“智慧的光”的意思；这篇小说后来又被预告将刊发于《创造》创刊号，题名《圆明园的秋夜》，后来为《茫茫夜》所取代；另外，我们在于听《郁达夫简传》、郁云《我的父亲郁达夫》、稻叶昭二《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里，也都能搜索到它的存在。

小说开头有这样一段文字，交代了这部小说的整体构思。

我想写的东西大致有二。一是《秋夜之事》，欲先从K的性格描写入手，接着是圆明园凄凉的景象，最后加入神秘吹箫人的传说；二是写在东京的我国留学生所遭受的虐待、留学生的复仇心、意志薄弱的主人公的愚蠢行为和愤怒之后由绝望而自嘲以及在辗转漂泊中的某个夜晚，面对某一女仆自嘲后嚎啕大哭等等。

很显然，构思中的兄长的友人“K”的故事应该与郁达夫的首次北京之行，尤其是圆明园之行密切相关。

郁达夫第一次面对圆明园，应该就在抵京不久的1919年秋天。因为三年以后，我们在一篇叫《血泪》的小说里看到了这个记录：“这一年九月里，我因为在荒废的圆明园里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寒，害了一场大病……”以郁达夫小说此期的“自叙传”笔法，这番描写基本可以采信，如果我们把《圆明园的一夜》《血泪》和此间的日记捉在一起读的话。这番描写亦足见圆明园对诗人的震撼之深。

那么，为什么是圆明园？郁达夫在其《自传之五——远一程，再远一程》中，有一段值得重视的文字。

从嘉兴回来，路过杭州，在梅花碑的旧书铺里，我竟买来了一大堆书。这一大堆书里，对我的影响最大，使我那一年的暑假期，过得非常快活的，有三部书。……一部是无名氏编的《庚子拳匪始末记》，这一部书，从戊戌政变说起，说到六君子的被害，李莲英的受宠，联军入北京，圆明园的纵火等地方，使我满肚子激起了义愤。……

从嘉兴回杭，是1911年6月。郁达夫考取杭州府中后因膳费之故曲就嘉兴府中，6月因病辍学回富阳。这一年的暑假，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尚未发动，满清政府的统治正满目疮痍，摇摇欲坠。1860年10月，圆明园第一次遭英法联军蹂躏，几被烧成废墟；1900年再遭八国联军纵火，更被抢尽财宝，落得一片荒芜。面对圆明园的浩劫和泱泱古国的大耻，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有“义愤”和“反抗”在心间；甚至可